

红色印记

苏区时期的红色体育运动: 锻炼铁的筋骨

□卢晨 王有加

苏维埃运动时期,工农红军能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成功开辟革命根据地,这既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武装斗争的顺利推进,也离不开根据地军民们过硬的身体素质以及专业的军事素养。毛泽东曾发出号召,倡导“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强调了战时红色体育训练的重要性。

1929年红军入闽,福建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党和红军高度重视开展红色体育运动,“体育军事化”口号日益深入人心。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后,就利用休整时间开展了军事体育整训活动。由于当时革命根据地尚处于初创阶段,其稳定性和流动性并存,因此体育活动以军事体育为主,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自发性。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局势空前稳定和巩固,红色体育运动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央苏区的红色体育运动在红军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将红色体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上。《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指出新兵的训练“不只在训练各种机械的制度操法,而着重在锻炼身体与适合战斗中的活泼运用”。在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中,红军面临着新兵和俘虏兵数量增多而未能及时进行教育和整训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红军继承了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传统,在面临敌人多次“围剿”的艰苦环境下,利用战争间隙,从体能、技能、军事技术等方面开展红色体育运动。红军走到哪里,红色体育就开展到哪里,这不仅显著提高了红军官兵的革命信念和身体素质,还培养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其次,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积极投身于红色体育运动,以身作则,促进官兵平等,实现军民融合。朱德热爱打篮球,不仅经常亲自参加篮球比赛,还曾担任过篮球比赛的裁判员。彭德怀则喜欢踢足球,在率领红军进入福建期间,在攻克宁化县泉上之后,他经常利用傍晚的空闲时间,带领红军中的足球爱好者在宁化县县城的火烧坪,与当地的工农群众组成的青工队进行足球比赛。毛泽东深知强身健体的重要性,坚持参加跑步、爬山、游泳、体操等体育活动,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这些历史事实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开展体育运动方面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

此外,红军还经常在军队内部举办红色体育竞赛活动,这些活动通常在革命节日和重大战役胜利后召开,意在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例如1932年5月4日红一、五军团为庆祝漳州战役胜利举办“红五月运动会”,1933年红十二军在武平永平寨战役后举办福



中央苏区“五卅”运动大会排球冠军——少共中央足球队

建军区体育大会,1933年11月7日福建军区举行十月革命节运动大会,1934年8月1日红一方面军举行体育运动大会……不仅丰富了驻军生活,而且对中央苏区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3年红军学校举办的“八一”红色体育比赛中,涌现出三发三中的特等射击能手150名、特等掷弹手180名。聂荣臻曾指出:“红军的运动会和一般日常所说的运动会不同,它是紧紧地结合作战,培养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压倒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

中央苏区在开展群众红色体育中也做了多方面工作。首先是建立群众体育组织,1929年古田会议后,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俱乐部组织,下设运动委员会,以“锻炼铁的筋骨,保卫苏维埃政权”为目标,开展的运动包括普通操、器械操、拳术、球术、田径赛、劈刺以及竞赛游戏等。

自1933年起,随着《俱乐部的组织和活动纲要》《俱乐部纲要》等指导文件的贯彻执行,俱乐部的规模得到了显著扩大。至1934年1月,闽粤赣三省的俱乐部数量已达到1656个,工作人员达到4968人。同时,民间自发成立了铁血团、武术馆等组织,经常参加红色体育运动的近10万人次。从中央到地方,从城镇到乡村,军队和民间普遍建立了红色体育组织。

其次是开展体育设施建设。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财政困难,开展体育经费有限,但这并未阻挡苏区军民发展体育事业的决心。例如,1933年的《五个月卫生计划》明确要求每乡设立一个公共体育场。中央苏区军民因地制宜,先后修缮和修建了宁化县火烧坪体育场、上杭县旧县石圳潭田径场、龙岩县城关中山公园体育场等公共体育设施。这些体育场不仅可供平时的军民训练使用,还可举办全省性的体育竞赛和检阅。

根据地的能工巧匠们发挥创造力,利用木、竹、石等当地材料制造了一批简单实用的体育器材,为根据地军民日常的锻炼和比赛提供了便利。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苏区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为增强根据地军民体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高度评价了苏区体育运动的开展盛况,指出:“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远)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此外,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会。1932年第二次闽浙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工作决议案》明确指出:体育运动应该广泛在工农群众中开展,积极发动群众经常参与各种运动,特别是对战争有需求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

等。这样的运动可以强健身体,锻炼革命斗争所需的技能。

据记载,从1930年3月到1934年9月,仅闽西苏区就举行了30多次的省、县、区、乡各级体育运动会、游艺会和大检阅,而闽西苏区举办的各种小型运动会更是不计其数。

1933年,为了向敌人发起总示威,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五卅”运动大会。这是中央苏区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赤色运动会,驻瑞金的各机关部队和群众代表近万人参加了开幕式。运动员来自多个单位,包括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及江西军区、江西省少先队等,总计180人。

这次运动大会持续了5天。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体育委员会正式成立,项英、王盛荣、邓发、张爱萍、施碧晨5人被推选为红色体育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的成立,解决了苏区红色体育由谁来领导的问题,使得苏区在群众体育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为推动苏区红色体育事业发展,《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先后开辟了“体育栏”和“红色体育栏”等专栏,广泛宣传、报道苏区体育赛事和各类体育动态。这些报刊持续报道红色体育运动会的进展情况,将这些信息以新闻形式迅速传达到苏区的每一个角落,扩大了红色体育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乡土史记

德化南山堂:百年华侨厝 逸事知多少

□郑智得



精致的装饰 许华森 摄

南山堂坐落德化县龙浔镇宝美村岭兜,粉墙黛瓦,咖色门窗,尤其醒目。门口大埕旁放着一排大陶缸,好似里面封存着岁月酿造的美酒。

这是一座华侨古厝,于民国五年(1916年)由爱国侨领林福信捐建。据《山兜林氏族谱》记载:林福信曾任马来西亚同盟会筹办局局长,为辛亥革命作出卓越贡献,被授予“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勋章;又在岭兜建南山堂,在大厅刻“忠孝廉节”,以励志毕生。

民国五年(1916年),49岁的林福信毅然从马来西亚还乡,准备建一座可与美湖林玉龙宅子相媲美的大厝——南山堂。林福信有这样的实力,他随父林和菜在马来西亚槟城经营罐头厂,事业有成,德高望重。民国成立以后,林福信以为天下太平了,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思想早已在他心里扎根,便回到了家乡。

建房从来都是国人建功立业最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南山堂的建造一波三折。刚建到一半,土匪头子派人把林福信请到三角街“吃茶”。不久,他带上一家人,重新走上了背井离

乡的路。南山堂的建设就这样停了下来。费时一年多的木雕构件,随着林福信再度出洋而散落四方。

闽南建筑里用精致的神龛来供奉列祖列宗,是一座老式房子富丽堂皇的最直观表达。然而,南山堂的厅头只有几片粗陋的木板,厅头上方还有九块木栏板也是空缺的,似乎也在诉说着仓促与遗憾。

这与南山堂其他的精致装饰是不相匹配的。边上廊庑上方有两对木刻垂花,呈莲花状,雕工精美细腻,与之相对应的是左边刻有“桂馥”,右边刻有“兰馨”的枋匾。大房门楣上刻有“永膺多福”“长发其祥”,字迹依稀可辨。大房的木雕花窗已拆除,换上了生硬杉木板;六扇一人多高的巨幅雕花已被两扇木门替换,空洞地向我们敞开。阳光从天井投射下来,照在厅面木板上,隐约可见刀刨过的痕迹,雕刻的楹联字迹已模糊难辨。

闽南有个习俗,一般起新厝时,常取老厝厝堂的一字作为新厝堂名的一部分。林福信的父亲林和菜先后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行医,建立养元药铺,清光绪七年(1881年)回乡

建起一座漂亮的番仔楼,名叫“聚福堂”,后来被拆掉了。依习俗,林福信建起的新厝本该用“聚”或“福”字组成堂名,然而他偏偏取名“南山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放马南山,卸甲归田”,“南山”二字寄托了中国人无限梦想。从他的经历来看,时逢乱世,或者对天下太平的渴望更为迫切一些吧。

“留福与子孙,不必尽黄金白镪;种心为产业,由来皆美宅良田。”享年82岁的林睦殿是林福信的第四代后裔,在南山堂出生长大,娶妻生子,他清楚地记得大房窗边已磨灭的一对楹联。

大厅通透敞亮,巨柱粗梁,硕大横梁上题写“福星拱照”四个大字,略带泛黄的素纸日渐脱落,更显岁月更迭的痕迹。厅面木墙上刻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字高一米,宽近三尺,字体端庄雄厚,笔法刚劲有力。

南山堂与岭兜古窑址处在同一条山岭上,后山上的陶瓷碎片散落一地。林福信的父亲早年从事陶瓷起家,受清诰封“奉政大夫”。孙子林友元,年轻时随父三至槟城,而后回国创业,合股开办通华、步华瓷业公司。林睦殿

是林福信的第四代后裔,曾被评“福建省十大杰出能工巧匠”。他于1978年开始从事瓷土配方研究,研制的“玉红瓷”曾获全国第九届发明展览会最高发明成果金奖,研发的“玉白瓷”在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第83届雷比那竞赛中被授予特别荣誉奖。



南山堂

许华森 摄

史海钩沉

赵汝愚对福州西湖的治理及其市民化

□丘新洋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与外戚韩侂胄不和的赵汝愚以集英殿修撰出任福州知事。淳熙十年(1183年),他奏请朝廷开发福州西湖。

或许因为东湖、南湖或淤塞或被占的遭遇,使得赵汝愚尤为重视西湖对福州农田灌溉防洪之利。他在奏疏中说,福州地狭民贫,“全仰岁事丰登,田畴广殖,小有荒歉,难以枝梧。况田并湖,弥望尽是负郭良田,自从水源障塞之后,稍遇旱干,则西北一带高田,凡数万亩皆无从得水。至春夏之交,积雨霖霖,则东南一带低田,发泄迟滞,皆成巨浸”。

南宋朝廷批准赵汝愚关于福州西湖疏浚治理的请求,并从州府财政中开支,“岁不过损州公使库池户数百缗”。获得朝廷支持后,赵汝愚立即着重开展对福州西湖的治理工作,其方法大体分为三方面:其一,申明政令,退还还湖,加强湖区的监督管理,打击地方豪绅,以免湖区面积被占;其二,疏浚湖泊,控制西湖水流蓄泄,进而恢复防洪灌溉之职能;其三,广植树木,兴修亭台楼阁,使福州西湖成为市民休闲娱乐赏之处。

为避免池户占据湖地,赵汝愚特地申明,严禁侵占湖区面积,把西湖管理收归公有,并于西湖设置五个闸口,派专人看管,“湖之闸高六尺,长二丈三尺,板二重,各五片,高五尺,长一丈一尺五寸,开元寺看管。第四闸,高六尺,长二丈三尺,板二重,各五片,高四尺五寸,长九尺,安国寺看管。第五闸,高六尺五寸,长三丈五尺,板二重,各四片,高四尺,长一丈七尺,东禅寺看管”。

闸口常常被锁住,只有大潮涨起的初三、十八才打开闸门,让民众船只进出。此种方式限制了民众在湖区内的活动,达到保护西湖之目的。除增设水闸外,赵汝愚还在西湖修建凤池桥堰一座,高五尺,长二丈四尺。当西湖附近的池塘枯竭时,允许民众用水车把湖水引入池塘,以助当地农田水利灌溉,不但使附近农田免受干旱之苦,而且保证了部分与西湖相通的河道或沟渠的充足水源,进而延伸了西湖对农田的灌溉面积。

并于西湖岸边的凤池桥、鼉潭等处建立三所巡捕屋,每屋均驻守由延祥寨派遣的四名军士,十日轮换一次,对民众或豪绅占据湖区面积起到威慑的效果,也便于监督湖区周边民众的日常生活,阻止他们入湖捕鱼或从事其他活动。湖区本应综合开发,以利民生,但因此前有民众借口捕鱼进而侵占湖区,也有民众广植菱芡加速淤积的现象,赵汝愚不得不下令近湖居民不得入湖放置捕鱼网具。

赵汝愚把西湖现有湖区面积等数据记载下来,编录西湖新买官地、陆基簿十本,其中四本分别藏于福州、侯官县、怀安县、闽县的档案库,其余六本则分藏于雪峰、鼓山、东禅、西禅、支提寺、紫极宫等寺,作为以后湖区面积的资料凭证。此外,还直接干涉西湖植被种植,“自迎仙桥至南湖,及上斗池,惟许种莲,不得别种他物”。

赵汝愚的疏浚治理工作,恢复了西湖昔日的灌溉功能,使侯官县、闽县、怀安县共計七千三百一十一亩的良田得以灌溉,其中闽县三千五百九十八亩,侯官县一千六百八十三亩,怀安县二千三百亩。资料记载,福州三县承食水利田总计一万四千四百五亩,其中西湖灌溉七千三百一十一亩,东湖灌溉怀安县七千九百四十四亩。但是,到王应山主编《闽都记》时已讹误为“城外西湖溉三邑民田,至一万五千余亩”,后方志多以讹传讹。

朱熹盛赞其西湖疏浚治理之功为“越王城下水融融,此乐从今与众同”“百年地辟有奇功,创见犹惊鹤发翁”。罗愿亦有诗言“四时镜净登临美,万顷云垂灌溉通”。实际上,翌年八月福州即遭淫雨霏霏两个多月,幸好西湖已疏浚治理,三县民田免受洪涝之害。

对西湖疏浚治理后,赵汝愚还试图恢复其昔日繁盛的光景,并辟其为市民休闲娱乐赏之处。为此,于威武堂故址基础上临水兴建澄澜阁,与西湖楼并之,又修建迎仙桥、凤池桥和鼉潭三桥,重修闽国王延钧时的水晶宫,凡此种种亦获朝廷赞同。

福州西湖得到赵汝愚等人的治理疏浚后,虽然面积没有恢复闽国时期的环湖四十余里的旧貌,但它成为时人游玩娱乐的场所。当时有诗云“浮来烟岛纷纷相就,引出沙禽好自游”“月插花影鳞鳞碧,风入荷花冉冉香”“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教且种芙蓉”“梅柳两堤连绿荫,菱荷十里散香风”等。时人留存的大量诗词,为后人了解福州西湖的风景面貌提供十分宝贵素材。

通过上述诗词可知,彼时西湖堤岸上已种植不少品种的树木,有杨柳、松树、杉树、桃树、李树、梅树等,湖内亦植有荷花,鱼游湖底,楼台棋布,津桥横卧,公园景致初具规模。词人辛弃疾游玩福州西湖后,亦留有“说与西湖客,观水更观山”“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等名句。

宋时社会稳定,城市商业娱乐兴盛,文人墨客宴饮雅集盛行。福州西湖虽属外城,但仍吸引不少文人墨客前至,他们或泛舟湖上,或吟诗作对,或弹琴吹唱,游者身影中不乏南宋名臣贵胄,如李纲、辛弃疾、朱熹、陈康伯、李麟、罗愿、陈俊卿等。李纲湖亭会宴,朱熹书院传学,西湖旁成立有文人组建的西湖社,所谓“诗人尽入西湖社”,夜游西湖也成为当时文人的休闲活动之一。

除文人骚客外,福州城市居民亦常光顾西湖,修葺后的西湖园林获得游客赞誉,诗载“陌上游人夸故国,十里水晶台榭”。若逢端午时节,福州常以龙舟竞渡的方式纪念屈原,是时龙舟竞渡,百舸争流,锣鼓喧响,共斗轻舸,如蔡襄所写的“尽日旌旗停曲岸,满潭钲鼓竞飞舟”。由此可知,西湖俨然成为南宋福州市民赏玩的公共空间。

赵汝愚为何将其辟为公共园林,供市民阶层游赏?笔者以为有两点:其一,是赵汝愚文人士大夫气质所致,对景色风光充满遐想,其游览杭州西湖时亦留有诗篇,云“水光中,烟霞影里,涌出楼台”“天香暗逐风回,正十里荷花盛开。买个扁舟,山南游遍,山北归来”;其二,是宋时城市已由汉唐的行政型转换为商贸娱乐型,以及宋代人民文化和精神需求的与日俱增,加之彼时正值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际,福建农业商业获得空前发展,故而催生出市民阶层游赏活动与精神消费文化。